

#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宋志勇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 一 日本对华侵略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1933年5月31日,中日军事当局在天津签订了《塘沽协定》,九一八事变由此基本结束。对于《塘沽协定》签订的意义,中日双方的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都有所提及(见《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第二部第一章),但认识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日方报告书对此没有展开论述,只是认为“塘沽协定的签订,宣告满洲事变大体结束”,它实际上强调了日本对华侵略过程的“阶段性”。而中方报告书对《塘沽协定》签订的意义颇为重视,将其明确定性为“日本‘满洲事变’的总结和入侵华北的开端”,强调了日本侵华过程的“连续性”,比较接近“十五年战争史观”。本人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过程既有“阶段性”,也有“连续性”,“阶段性”中带有“连续性”的要素,“连续性”中带有“阶段性”的特征,两者共存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非此即彼的断定都缺乏客观性,容易走向片面。事实上,《塘沽协定》签订后一直到1935年夏,中日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努力,两国关系上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呈现出比较安定的状态,与此前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卢沟桥事变相比,的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特别是军方对华侵略政策并没有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发生根本上的转变,其侵略步伐并没有真正停止,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关内华北。关于把分裂华北正式确立为“国策”的时间和标志,中日双方的报告书稍有不同。中方报告书把1936年1月陆军省制订的“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作为日本“正式把分离华北承认为国策”的标志,而日方报告书则看重同年8月广田内阁制订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认为该文件将“分治”华北确定为政府的方针“值得关注”。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合理性,但不管那种说法,日本分裂华北成为日本的“国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塘沽协定》以后长时间的策划、积累而形成的,呈现出“连续性”的一面。“阶段性”与“连续性”共存,是《塘沽协定》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特征。这里还须指出的是,日本这种对华侵略政策的“连续性”不是历史唯心主

义的宿命论,而是日本决策者在多种对华政策选择中的人为选择。

## 二 否定国民党政府与分裂华北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中日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日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亲善外交”的动向。但是,日本军方与政府在对华认识上特别是在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体现在对华外交上就出现了所谓“双重外交”的现象。对于这一问题,日方报告书比较重视,做了较为明确的阐述。日方报告书谈道:在华日军认为国民政府的对日改善关系的“诚意”不过是一种“姿态”;认定“国民政府不放弃收复失地,其本质上还是‘抗日’”。据此,日本军方采取了与日本政府“逆行”的对华政策。

本来,中国国民党成立后,由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创立者与日本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认为其有利用的价值,故对国民党并不排斥。但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实行国共合作,提出反帝施政纲领,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政权再次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并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东北,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后,日本认为这威胁到日本的“满蒙权益”及其在中国北方的“影响力”,日本政府特别是军方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方认为国民党的对外政策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国民党政权的存在阻碍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实现。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政府先是不愿承认,后虽勉强承认,但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也一直不顺畅。而且,日本军方还在寻找一切机会推倒国民党及其政权,这也是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历史根源。

1933年,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编印了一本《中国国民党的概观》的调查报告书。该书是这样认识国民党的:“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就失去了目标,革命元气大为衰退。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兼职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苛政滥行与军阀时代无异,国民党不过是取代旧军阀现身的新军阀而已。而且国民党真正的统治,实质上仅限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并未能实现全国的统一。政客和旧军阀依然争权夺势,热衷于争夺地盘,内乱依然连绵不断,根据利害关系‘合纵连横’这一‘支那国民性’仍被发挥的淋漓尽致。”<sup>①</sup>该报告书代表了日本陆军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基本认识。

这一时期日本军方的一些“中国通”也持有相近的观点。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矶谷廉介少将(1935年春转任驻华武官)也认为,妨碍日中关系安定及造成中国内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精神”。他认为国民党领导层在第三国际的引导下,把纯粹的“国民革命”“诱导”成“共产革命”。只要国民党领导层的这一“指导精神”不改变,中日关系和中国内乱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sup>②</sup>而另一位跟军部关系密切,被尊为军方“思想领袖”的大川周明,也认为南京政府只代表国民党的私利,领导排日,与军阀并无两样,只能是一个过渡政权,在完成破坏任务后走向没落。为此,1935年他指导其掌控的《东亚》杂志,将编辑方针确定为“打倒蒋政权”。<sup>③</sup>

总之,直到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军方仍不愿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并策划各种阴谋,意在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此后日本实施的分裂华北活动就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应该说,日

① [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的幻想和破灭》,东京:讲谈社1999年版,第178页。

② [日]波多野澄雄:《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载井上清等编:《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东京:原书房1988年版,第233页。

③ 吴怀中:《大川周明与近代中国——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与行动》,东京:日本桥报社2007年版,第161页。

本军方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认识有些是“误解”。南京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并无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标,相反,它还要利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维护和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政权和统治。一部分日本人对此认识不足,反映有些“神经质”。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日本军方主流观点认为国民党政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障碍,故罗织罪名,将其打倒。所以,反对、否定国民党政权与分裂华北在对华政策上具有一致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 三 关于“中国再认识”与“对华政策再探讨”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中都提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的“对华再认识”问题。中方报告书认为,缓远抗战的胜利,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1937年“佐藤外交”时期,日本政府在华北等问题上进行了具有缓和性的政策“调整”。但中方报告书对此没有给予太高的评价,认为“由于日本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对华政策和正确认识现代中国”,佐藤外交昙花一现,很快夭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方报告书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日本“对华政策的再探讨”,介绍了一些日本朝野人士对华认识的转变,特别是林銑十郎内阁时期即“佐藤外交”时期,日本政界、军界、经济界等出现的“对华再认识”的动向,以及停止分裂华北、摸索对华经济合作等具体的行动,并给予了“划时期的政策转变”的高度评价。

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西安事变之后特别是“佐藤外交”时期,日本对华确实有一些新的观察和认识,也有一些改善对华政策的动向。但是,不仅这一动向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且始终也没有成为日本对华认识和行动的主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积极发展国力的努力,特别是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确使日本的有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中国国力的发展,还意识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国家统一的大势,对日本的对华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对华再认识”的讨论。

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日本最为恐惧的是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后联苏对日,那样日本苦心经营的“满蒙”将腹背受敌,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获取的“权益”将受到巨大威胁。为此,一部分日本高层人物希望放松对中国的强压政策,改善日中关系,避免中苏联手。在此形势下,在对华关系上走进死胡同的广田内阁倒台。1937年3月,“佐藤外交”登场,倡导对华“平等外交”,甚至还提出停止华北分裂政策。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丝改善的“迹象”。

日本军界中的部分“中国通”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统一,重新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日军参谋本部派驻驻华大使馆的楠木实隆大佐在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本田忠雄交换意见后,达成如下“对支政策意见”并向军部谈了他的对华认识:

纵观中国现状,反中央各派虽尚存,但无论哪派都无法彻底地颠覆现中央政府,各派都力图在现任政府组织机构内安插自己的势力。因此,我若徒然坚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或分裂华北五省等旧观念,势必适得其反。深信应迅速改变旧式观念,堂堂正正地以中央政府为对象进行交往。不以南京政府为对象,通过威逼利诱地方政权引导日支邦交的政策,是只知日清、日俄战争时代的支那,而不知中国现状的表现。<sup>①</sup>

有过驻华经历的陆军省新闻班军官雨宫巽中佐也感慨地说:“很遗憾,现在的南京政府已经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的贫弱,无论是统制力还是军备都已不可忽视,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日渐强化

<sup>①</sup> [日]高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一)》,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389页。

中……蒋介石的人气也一天比一天增长。”日本“靠恫吓或口头威胁已经几乎不能胁迫南京政府。”<sup>①</sup>

楠木实隆和雨宫巽的对华认识,代表了日本军部一部分中坚军官及部分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华认识的转变,但这种比较客观的对华认识没有形成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政界、财界和军界的主流”对华认识并未根本改变,他们“否认中国的民族统一,否认以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统一,以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为目标”,这种主流的对华认识及其对华政策取向具有“坚硬根基”。<sup>②</sup>

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国力增强,客观上是对日本维护并扩大侵华权益的威胁,是日本不愿接受的。“佐藤外交”在表面上使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中日矛盾的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希望在维护日本现有对华侵略权益的基础上对华“亲善”,而中国则要求日本在恢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的基础上谈中日“亲善”,如先行撤销塘沽、上海停战协定,日本停止对华北主权的侵害等。但中国的这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要求在日本看来是“排日政策”,日本断不能接受。所以,“中国再认识”也好,“佐藤外交”也好,都不可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国民政府不再对日本的侵华行动逆来顺受的局面下,日本国内特别是军方高调“教训支那(对华一击论)”的观点很快就占据主流地位。

作为第三者的英美人士在分析日本的对华认识和对策时也认为:“如果中国取得了与日本同样的进步,日本将一触即溃。深知这一点的日本,不可等闲视之。要么在中国进步之前尽快将其击溃,否则就必须尽量防止其进步,将其始终放置在从属自己的劣等国的地位上。”<sup>③</sup>应该说,英美人的这种观察是一针见血,揭示出了日本军方、政府及部分民众面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心态。

上述各种对华认识的合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特别是军方的对华行动选择,并使日本最终走上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

#### 四 卢沟桥事变问题

关于日本侵华史上的老问题卢沟桥事变,中日双方的报告书都重视其背景、后来的发展和宏观分析,不再拘泥于谁打第一枪的传统争论(参见《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第二部第二章)。中方报告书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源于日军演习时出现的“枪声”,其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报告书中强调:“事实可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日方的报告书虽认为引发事变的枪击事件具有“偶然性”,但也揭示了日本从驻华日军到东京的军决策集团走向扩大侵略战争的政策决定过程,即卢沟桥冲突发生后,中国驻屯军、关东军认为冲突事件是个“好机会”,便实施了通过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打倒蒋介石、占领华北”的行动。东京的军事统帅集团也因“对华一击论”压倒了“不扩大派”,以及近卫政府也倾向于扩大事变而导致全国一致对华强硬,最终使事变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虽然没有明言,但日方的报告书实际上也承认了事变扩大具有的必然性因素。因此,中日报告书在对卢沟桥事变的阐述上虽然侧重点有

① [日]雨宫巽:《赤裸裸地看日支关系》(1937年4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网站(<http://www.jacar.go.jp/>)公开。

② [日]西村成雄:《“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3期,第96页。

③ [日]日本外交协会:《对支外交问题讨论摘要》(1937年3月25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网站(<http://www.jacar.go.jp/>)公开。

所不同,但对事变发展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事实的认定和分析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一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2005年即日本战败60周年之际,日本《读卖新闻》组织专门班子,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检证”。其中对卢沟桥事变扩大化的原因的“检证”结果是:“发动日中战争的目的,除了‘膺惩支那军的暴戾’(1937年8月15日的政府声明)之外,都不甚明确。”<sup>①</sup>纵观日本方面的大量著述,确有此印象。但实际上有一关键点是早就明确的,那就是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或直接占领。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一点也不含糊。卢沟桥的几声枪响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关键点就在于此。卢沟桥事变虽源自日中两军的一场小冲突,但“它是满洲事变的延长”。<sup>②</sup>而九一八事变表现出的是“支那的恢复国权、收复失地的民族运动,与日本发展大陆政策的冲突”,也就是“大和民族与支那民族的民族抗争”。<sup>③</sup>

卢沟桥事变具有必然性与偶发性并存的特征。说其必然性,是日本九一八事变以后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不满足于对东北的侵占,寻求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其首要目标便是华北。虽然1933年5月中日军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日军退回到了长城以北,但日本并未就此停止侵略中国的步伐。实际上,从当年开始,日本中国驻屯军每年都在制订侵占华北并进行统治的计划<sup>④</sup>;关东军从1934年底开始,又酝酿新的侵入华北的计划;日本军部、政府也从1935年春开始,制订了分裂华北的一系列政策。掌控或侵占华北,成为日本的国策和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无论通过什么手段,日本一定要达到这一目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方面就认定:“非常明显,陆军此次发动事变的真正目的——在于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sup>⑤</sup>大量的事实证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政策是引发卢沟桥事变的根本原因,它体现了事变的必然性。

在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卢沟桥事变又有一定的偶然性。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日本政府或军部及中国驻屯军蓄谋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确切证据,而另一方面,当时华北的日军“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抗日”经常发生冲突,任何一次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事变。正是由于事变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并存,造成了日本决策集团在处理事变时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分歧。

“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产生,实际上也反映了日本决策集团内不同的对华认识。“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手握重要军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这位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对七七事变采取了与九一八事变迥然不同的做法。他担心出兵有陷入战争泥潭的危险,同时顾虑苏联出兵,使日本腹背受敌,故主张“不扩大”事态。他的部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石原莞尔“竭尽全力”向他的上级、同僚、部下解释不应扩大事态的理由:“现在的支那不是以前的支那,国民党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的国家意识正在觉醒。如果走向日支全面战争,支那就会利用辽阔的领土进行持久战,而日本的力量是不能将其降伏的,日本会陷入战争泥潭动弹不得。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还贫弱,当前应绝对避免战争,努力增强国力和军事力量,以期国防国策的完成。”<sup>⑥</sup>

① [日]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检证 战争责任》,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 [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东京:芙蓉书房1982年版,第91页。

③ [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第91页。

④ [日]参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13年“陆满机密大日记”》第2册2,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网站(<http://www.jacar.go.jp/>)

⑤ [日]岛田俊彦:《有关船津工作》,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47号,第106页。

⑥ [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第96—97页。

但日本军部绝大多数人的主张与石原正相反,认为“支那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如果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它立刻就会屈服。此时需要征服支那,把华北五省基本上纳入到日本的势力之下,与满洲相结合,强化对苏战略态势。而卢沟桥事件带来了实现这一目的求之不得的好时机”。而上述思维是“满洲事变以来陆军领导层不变的对支观、对支方策”。<sup>①</sup>

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后来也回忆道,当时陆军“扩大派”主张:“日本的敌人是苏联和中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先打垮中国的最佳时机,此时要坚决给中国以痛击。现在中国还没有像样的抵抗能力,只要拿下天津、北平,中国基本上就认输。如果再进一步拿下上海的话,本年12月间蒋介石就会倒台。”<sup>②</sup>

日本军界著名的“支那通”铃木贞一(陆军中将,曾任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企划院总裁),战后回顾导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时反思道:“日本太轻视支那的军队了,而轻视的结果就导致了支那事变的发生”,“支那事变……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人小看支那的表现。”<sup>③</sup>

应该说,这些当年参与侵华战争决策的军人的回忆和反思基本上是准确的。的确,除了既定的掌控或侵占华北的国策外,轻视、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导致日本把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另一要因。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队还没有输过一场对华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东北、进攻上海、分裂华北,中国都是步步退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甚至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由此,中日关系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只要日本付诸军事压力,中国就一定屈服,答应日本的一切要求。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及政府在处理事变方针上也沿袭了这一“惯性”。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在向天皇汇报时声称,“只要在天津一击,事件一个月内就会结束”。<sup>④</sup>日本的国家统治层,正是做着这种美梦,放弃不扩大方针,向华北大规模增兵,进而酿成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失败告终。

(作者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第97页。

② [日]《中岛铁藏中将回忆录》,见秦郁彦,《卢沟桥事件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③ [日]《铃木贞一谈话速记录》(下),东京,木户日记研究会、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4年编印,第232、241页。

④ [日]《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第105页。